

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

唐代

牛致功 著

TANGDAI SHIXUE YU MUZHU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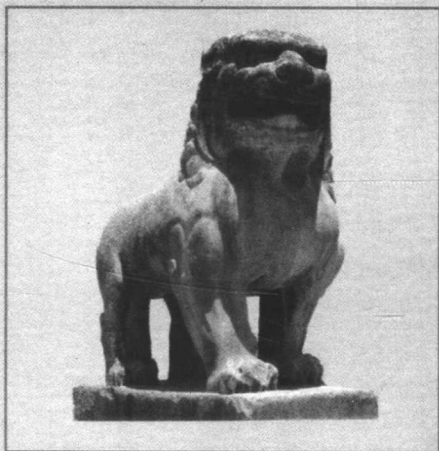
史学与墓志研究



三秦出版社

# 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牛致功 著



 三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 牛致功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9

(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

ISBN 7-80736-009-7

I. 唐... II. 牛... III. ①史学—中国—唐代—文集②墓志—研究—中国—唐代—文集

IV. K242.07-53②K877.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1697号

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

## 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牛致功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信达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88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36-009-7/K·10  
定 价 26.00元

## 前 言

这本书包括以下内容：唐代的史学、唐代墓志研究与史学的关系、有关唐代历史的一些论述。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后来，逐步发展到也做些史学研究。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必然认真阅读有关的古代史籍。同时，我还做过一段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这样，就促使我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古代史学的发展和史学家们历史观的演变与特点。

兴趣爱好和愿望有时是不能实现的。众所周知的原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除了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外，大量的时间要为无效的辛劳所占用，使精力充沛的人无可奈何。更加经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从不惑之年的中年人进入知天命者的队伍。正是这种原因，在那个时代即便是有过一些史学著述，也不宜和现在的研究成果同日而语。应当说，我真正做史学研究，特别是做唐代史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常对几个研究生说：我和你们是同时起步的。这是肺腑之言。

由于兴趣和爱好的作用，我首先从唐代史学的研究开始，陆续写了十数篇文章，到1989年，我将这些文章合编为《唐代的史学与通鉴》，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出乎所料，这本书很快销售一空了。16年来，我的兴趣和爱好逐步有所转移。我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原来知之甚少的唐代墓志。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已于1994年退休，但到2002年还能请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后来，我又继续做了一些墓志的研究。在这期间，对我非常熟悉而且又十分关心的王双怀同志多次向我

建议，要我把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正式出版。我很受感动。三秦出版社社长魏全瑞同志也欣然应允了此事。显而易见，一边是良好的建议和积极的鼓励，一边是具体安排，实施出版。由于这些好友的促进和实实在在的支持，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把16年前出版的《唐代的史学与通鉴》和有关论文，加上《唐代碑石和文化研究》出版后新写的几篇有关唐代墓志的文章，合编为《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重新出版。

另外，书中还收集了几篇看来似乎与主题无关的文章，其实则否。例如，《李渊的历史地位》一文，看来是研究历史人物，实际上是我研究《大唐创业起居注》及有关历史文献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是研究历史文献的继续深入和发展。《武则天称帝的真相》一文，好像也是研究历史人物，但这是研究历史文献和墓志相结合的产物。至于其他几篇有关武则天的文章，无疑也有助于理解武则天称帝的真相。

随着年龄的增长，患上了眼疾，视力日渐下降。2004年，不得不放弃已有浓厚兴趣的唐代墓志研究计划，开始优哉游哉、悠闲自在的生活。

自从进入知识分子队伍后，专心致志想在读书、写作中发展乐趣，天长日久，不知不觉醉心于此，别无他求。半个世纪的读书、写作习惯，使我的兴趣十分单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旅游，没有什么他人常有的爱好。所以，在停止原有的工作以后，我就真正成为游手好闲之辈了。正当这转折的关键时刻，能将这本书出版，不能不使人感到快慰。

魏全瑞等三秦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机会，王双怀和贾云同志为这本书的出版又多次建议并尽力促成，贺金娥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凡是文后未注明原载何处者均见《唐代的史学与通鉴》。在此谨向与我有深厚友谊的同志们敬表诚挚的谢意。

2005年4月

## 目 录

前言	/ 1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	/ 1
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	/ 24
唐代史学家的经济观	/ 40
唐代的史学与政治	/ 56
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	/ 80
魏徵的史学地位	/ 94
唐初杰出的史学家令狐德棻	/ 111
关于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	/ 125
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	/ 137
刘知几的修史主张	/ 147
有功于唐代史学的韦述	/ 165
柳芳及其史学	/ 172
刘肃与《大唐新语》	/ 185
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 看《资治通鉴》的中心思想	/ 202
《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	/ 223
从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看 《唐鉴》与《通鉴》的异同	/ 241
墓志研究与史学的发展	/ 253
《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 若干人物生卒年代订误	/ 260

◎ 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武则天称帝的真相	/ 279
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	
——读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志铭》	/ 285
有关泉男生降唐的问题	
——读《泉男生墓志铭》和《泉献诚墓志铭》	/ 297
《唐代帝陵研究》序言	/ 307
《唐折冲府汇考》序	/ 310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 312
李渊的历史地位	/ 346
关于唐高祖许立李世民为太子的问题	/ 391
铁血皇后武则天	/ 396
武则天与洛阳	/ 423
评两本研究唐代长安的专著	/ 440
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	/ 456
《河洛春秋》20 华诞有感	/ 463
又一个年轻人的时代	/ 466
思古望新 继往开来	/ 469
为年轻人超越自己而高兴	/ 472

##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似乎毫不相关，但认真深入研究一下，不管从史学思想上，资料与编撰体例上，二者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以为，《通鉴》是唐代史学继续发展的产物。没有唐代史学打下的基础，司马光是难以有《通鉴》那样的不朽巨著的。

### 从史学思想上唐代史学 与《通鉴》一脉相承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修成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原来是一部书，称为《五代史》。这就是后来的《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的修撰者虽然分别是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和魏徵，但总负责的是魏徵。魏徵不仅组织领导了修撰工作，同时还亲自撰写了梁、陈、齐、周诸史的总论与《隋书》的序、论。这样一来，《五代史》中就充分反映了魏徵的史学思想。

魏徵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的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反映。魏徵在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他千方百计地为唐太宗出谋划策，甚至犯颜直谏，为巩固唐太宗政权而尽心竭力。为了同一目的，他又通过修朔，从历史上为唐太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遗余力地为唐太宗寻找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历史借鉴。二者虽然殊途同归，但毕竟各有其不同的内容。

魏徵史学思想的特点，就是他认为历代王朝的兴衰，其根本



原因在统治者本身。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需要乞求天的恩赐，也不能依靠别人；必须自己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才能有所收效。正因为如此，魏徵的史学思想在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起了转折点的作用。

两汉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思想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史学领域中，各种史籍的内容都有明显的反映。例如，班固在《汉书》中编造了一套自尧、舜以至夏、商、周、秦的刘氏世系，从而得出结论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sup>①</sup>显然这就是说，秦的灭亡，汉的建立，是天的安排。

西晋时，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也同样宣扬这种观点。因为曹操是谯（安徽亳县）人，所以，关于曹丕即将代汉的情况，陈寿写道：“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以此预示“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45年后，果然又一次“黄龙见谯”<sup>②</sup>，当然这就意味着火德（汉）当灭，土德（魏）当兴于谯。在汉亡前45年，天就预告人们，曹氏将要对汉取而代之。可见曹氏代汉是顺乎天意的。至于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如汉魏故事”，也是由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sup>③</sup>。西晋初年的史学家，用这种天人感应说来论证西晋统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无疑是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后来的《后汉书》、《宋书》、《魏书》等等，无不充满着这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可以说明统治者取得地位是合乎天意的，但同时又说明失去地位也不是人为的。由此可见，抛开人的作用，空谈天命的理论，仅只能消极地说明广大人民应当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并不能起到积极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的作用。

魏徵在负责修撰《五代史》的时候，抛开了这种消极思想，否定了天的作用，主张千方百计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魏徵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北齐的灭亡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齐后主前后，齐国的地理条件没有变化，太行山、长城、长江、淮水都依然如故，甚至国家的赋税收入、军队的多少都是原样，但为什么“前王用之而有余，后主守之而不足”呢？主要原因是“前王……沐雨栉风，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赏必罚，安而利之，既与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后主则不然，以人从欲，损物益己”，挥霍无度，骄奢淫逸。“土木之功不息，嫔嬙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殫，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因此，导致了“土崩瓦解，众叛亲离”<sup>④</sup>。同样的客观条件，国家有兴有亡的差别，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同的人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在论及陈朝的灭亡时也是如此。他认为陈后主不像陈高祖那样，“拔起垆亩，有雄桀之姿”，而是“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根本“不知稼穡艰难”<sup>⑤</sup>，因而他堕落腐化，导致了政治腐败。关于隋朝的灭亡，魏徵也是从隋文帝、隋炀帝身上去找原因。由此可见，北齐、陈、隋等王朝的灭亡，尽管其具体情况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统治者本身造成的，不是天的作用。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既然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关键在于统治者本身，那就只有从历代统治者的活动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才能巩固当代统治者的地位。在《五代史》中反映的魏徵的这种史学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一样，完全迎合了唐太宗的政治需要。

从政治上总结历代统治者兴亡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sup>⑥</sup>，是西周统治者的观点。刘邦即位以后，听了陆贾总结了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历史经验，认为非常重要，立即就要陆贾为他编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sup>⑦</sup>。被刘邦大加称赞的《新语》，就是这种政治要求的产物。张释之也是因为“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sup>⑧</sup>，而使汉文帝非常满意

的。唐朝的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唐朝初年，李渊就非常注意总结秦、隋灭亡的教训与汉、唐兴盛的经验。他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隋朝末年，“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致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因而他就“拨乱反正”，虚心听取意见，致使君臣合作，政权巩固。唐太宗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是人所共知。他不断与大臣们讨论“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的原因，故而深知“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所以，他把大臣们当作“耳目股肱”，希望君臣“协力同心”<sup>⑨</sup>，治理好国家。不难看出，由于统治者亲身感受，直接从政治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由来已久了。然而，通过撰写史书，间接为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寻找借鉴，则是从唐初开始的。如果把这称为鉴戒史学，那么，魏徵总负责的《五代史》就是鉴戒史学的开端。

稍晚于《五代史》的《晋书》，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撰写了史论，就是因为西晋是统一的、短暂的王朝，“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于是，他就“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sup>⑩</sup>。他批评司马氏“前忠而后乱”，“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sup>⑪</sup>，正是借古喻今，告诫臣下不要像司马氏那样，颠覆李氏政权。

唐太宗对晋武帝的评论，也正是唐初政治家的观点。他说，晋武帝初期，“敷化导民，以佚待劳，以治易乱。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但由于他“不知处广以思狭”，“居治而忘危”，所以没有采取长治久安之策，致使“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sup>⑫</sup>显然这是告诫他的子孙们，统治者要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治”，必须预见到“治”可以转化为“乱”。统治者必须千方百计地防止这种转化，否则

就会像西晋那样很快灭亡。

唐太宗这种间接地寻找历史借鉴的思想，与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完全一致。他与魏徵讨论政事时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就是说，皇帝的地位不是永远牢固的，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魏徵还进一步分析了皇帝的地位不能永固的原因。他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sup>⑬</sup>唐太宗批评晋武帝“居治而忘危”，魏徵认为“居安忘危”是所有亡国之君的共同特征。他们这种政治观点与史学思想的完全一致，正是鉴戒史学的鲜明特点。

《贞观政要》虽非史学专著，但《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列入《史部·杂史类》，也算唐代史籍的组成部分。本来，吴兢撰《贞观政要》是因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为了使后来的统治者“克遵前轨，择前而从”<sup>⑭</sup>以成更大功业，所以，戈直在序中说：“《贞观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不过，就该书的内容而论，涉及范围很广。唐太宗君臣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自五帝、三王，下至隋炀帝，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内容，无不有所涉及。因此，该书的内容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把总结的经验教训落实在贞观年间的政治上。换言之，贞观之治，是唐太宗统治集团在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历史前进的措施而形成的。正因如此，《贞观政要》的内容，不仅“唐世子孙……书之屏帷，铭之几案”，而且“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sup>⑮</sup>由此可见，《贞观政要》是一本充分发挥了作用的鉴戒史学著作。

《通典》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其作者杜佑（735—812）历经唐代的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也就是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的动荡时期。他从18岁起以父荫为济南参军，

后又历任工部、金部郎中，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籾使，又至检校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宰相等职。既然他出入将相，长期作官，当然要为维护唐朝统治者的地位而费尽心机。他编撰《通典》，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他在《献通典表》中说：“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于是，他就根据“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sup>⑥</sup>的道理，编撰了《通典》。这就决定《通典》也必然有鉴戒史学的内容。

杜佑认为，唐代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是人事，岂唯天时。”这与魏徵在《五代史》中的观点一样，抛开天的作用，从人的因素中寻找国家兴亡的原因。这个结论，是根据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他说：“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颀”，这些都是“成王业，兴霸图”，“富国强兵”的“贤者”。

既然国家兴亡的原因在统治者本身，于是杜佑认为，要使社会安定，必须“薄赋轻徭”。要做到“薄赋轻徭”，统治者必须严格约束自己。他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sup>⑦</sup>非常明显，这是通过史书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在这方面，可以说《通典》与《五代史》、《贞观政要》等书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

司马光编撰《通鉴》，是因为他认识到“治乱之原，古今同体”<sup>⑧</sup>。所以，他希望统治者能从读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借鉴。但由于自古以来的史书太多，一般人读起来尚有困难，何况政务繁忙的皇帝呢！于是，他对旧史籍的内容进行认真选择，“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sup>⑨</sup>编成《通鉴》，供皇帝阅读。既然是专为皇帝撰写的史书，当然是要以历代的治乱兴衰为其主要内容的。

在《通鉴》中，司马光也完全抛开了天人感应说，主要从统

治集团本身去探索治乱兴衰的原因。他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尝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sup>④</sup>故而他认为统治者“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sup>⑤</sup>。这正是司马光重视“人事”，不谈天命的证明。

他关于汉武帝与秦始皇帝异同之处的论述，也充分说明他认为统治者地位的巩固与否，关键在统治者本身。他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sup>⑥</sup>这就是说，秦的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奢极欲，劳民伤财，迫使农民起义所致，而汉武帝虽然也曾如此，但他还能分清是非，不受人蒙蔽，重用贤人，而且“晚而改过”，所以避免了灭亡的危机。这与班固用五德终始说解释秦亡汉兴截然不同。

司马光认为，统治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统治者地位能否巩固，关键在于统治体系能否维持下去。例如，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承认他们三家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威烈王自己破坏了“礼”。尽管韩、赵、魏三家强大，如果他们“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强大的诸侯还可以讨伐他们。但由于他们“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礼被破坏，后果是严重的，因最高统治者是靠礼统治广大人民的。司马光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就是纪纲。天子只有运用纪纲的作用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他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

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sup>②</sup>非常明显，所谓“礼”就是自上而下的一套统治体系，是儒家思想的内容。这一套体系如果不被打乱，统治者的地位当然是巩固的。

要有效地维持统治体系，必须重视“教化”和“风俗”。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臣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他认为东汉光武帝就是明智君子。因为光武帝“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继之明帝、章帝也是如此。“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不难看出，所谓“教化”，就是用儒家思想教育人民；所谓“风俗”，就是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由于“教化”立，“风俗”成，所以东汉政权稳定。自桓、灵以后，情况大有改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但因为固有的“教化”与“风俗”的影响，即使像曹操那样，“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sup>③</sup>

由此可见，司马光不仅要统治者重视社会秩序的作用，而且还说明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

在统治者怎样用人方面，司马光总结了一套经验。他把人分为四等：德才兼备者谓之“圣人”，德才皆无者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他认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为什么“小人”还不如“愚人”呢？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

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sup>②</sup>在司马光看来，自古以来，乱国篡权者多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因此统治者为了防止别人颠覆自己的政权，宁可用“愚人”，而不用“小人”。

司马光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sup>③</sup>这就是说，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在于君。君如果不千方百计巩固自己的地位是危险的。

司马光为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借鉴是多方面的。宋神宗亲自为之作序，并赐名曰《资治通鉴》，正说明该书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后来的统治者也都把《通鉴》奉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指南。金世宗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世之良史，无以加也。”<sup>④</sup>元朝、明朝的皇帝，也都要臣下为他们进讲《通鉴》，以做为他们制定政治措施的借鉴。清末的统治者也曾欲借助《通鉴》挽救其江河日下的危机<sup>⑤</sup>。这都说明《通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鉴戒史学发展到《通鉴》已经到了成熟阶段。

综上所述，从《五代史》开始的鉴戒史学，经过《晋书》、《贞观政要》、《通典》到《通鉴》，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五代史》起了古代史学思想转折点的作用，《贞观政要》与《通典》，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为统治者提供了借鉴，《通鉴》则全面系统地为统治者总结了经验，提供了借鉴。因而，我们认为，《通鉴》是鉴戒史学的集大成者。

### 从资料上唐代史学 为《通鉴》创造了条件

自古以来，任何史书的编撰都必须有充足的资料。一本史籍



的史料价值如何，直接影响着史书的史学地位。因而，史学家对待史料的态度和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刘知幾对古代史书的总结，提高了人们对史料的作用的认识，从而促使唐代史学家更加认真地对待史料。同时，由于政治的需要，唐朝政府也重视史料的搜集，给唐代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唐代史学家对修史工作中的史料问题就特别重视。在这方面，《通鉴》与唐代史学密切相关，并且有共同之处。以下分两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广泛搜集资料。唐朝正式建立设馆修史的制度以后，即明确规定了政府的有关机构必须按时向史馆报送有关资料。例如，礼部按季录送祥瑞的资料，太史按季报送天文祥异的资料，鸿胪寺负责从少数民族或外国来使中了解各种情况，如来使所代表的民族或国家的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及其君主姓名等，刑部所司的法令变改，断狱、新议等，必须立即报告。《唐会要》卷六十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记载非常详细。这说明唐朝政府把搜集史料是当作重视修史的一个方面的。

刘知幾认为，修撰史书必须广泛搜集史料。没有史料，即使史家很有才干也无济于事。于是他说：“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sup>②</sup>这里所谓的“学”，是指工具和原料。没有原料就修不成宫室，当然没有史料就修不成史书了。他还更直截了当地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他以左丘明修《左传》为例说：“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机》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同时，他还以司马迁和班固的修史为例说：“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除了与《史记》重复的部分以外，“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词。”在刘知幾看来，《左传》、《史记》、《汉书》，“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sup>③</sup>，其重要